

鲸的认知与语境——中国古代鲸豚类的社会史深描

刘金岁月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中国古代先民对鲸豚类动物的认知具有清晰可辨的脉络, 从先秦至汉魏的神话想象与官方定名, 到两晋至唐宋的博物考证, 再到宋元近海实用化, 至明清形成相对成熟系统的看法, 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内陆文明向海洋拓展过程中人与海洋关系的文化建构。鲸豚既是海洋生物, 也曾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符号、信仰载体以及生态标识。对于鲸的认知史是中国传统环境观中敬畏、实用、节制等要素共生的案例。复原古人对鲸豚类动物的自然感知及文化认知, 对反思传统环境观、拓展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具有参照意义。

关键词: 鲸豚认知史; 中国古代海洋社会; 历史人类学; 环境史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0

Cognition and Context of Whales: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etaceans in Ancient China

Liu Jinsuiyu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people's cognition of cetaceans presents a clear and traceable evolutionary thread. From myth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official nomencla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Wei dynasties, to natural-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Jin to the Tang-Song dynasties, practical utilization in coastal areas during the Song-Yuan dynasties, and finally a relatively matur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this process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ocean relationship as inland civilizations expanded toward the sea. As marine creatures, cetaceans also functioned as political symbols, religious carriers, and ecological markers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e cognitive history of whales serves as a case embodying the coexistence of reverence, practicality, and restrai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nvironmental ethics. Restoring ancient people's natural perception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cetaceans is of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reflecting on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views and expanding research in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Key words: cognitive history of cetaceans;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society;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nvironmental history

自年鉴学派开启文化史、环境史转向[1]以来, 许多曾经被忽视的“他者”逐渐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 自然环境的各种要素也逐渐进入史学

视野。鲸作为一种海洋哺乳动物, 长期以来在人类与海洋的关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生物学分类上, 鲸通常指鲸偶蹄目鲸下目所涵盖的海洋哺乳

作者简介: 刘金岁月(2000—), 男, 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专门史; 江南区域社会史; 新文化史

动物，分为须鲸与齿鲸两大类，包含海洋与淡水鲸豚[2]。关于鲸豚类生物的生物学研究已成果颇丰，但将鲸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相关探索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中国古代沿海先民，在与海洋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鲸这种独特的生物并非一般的“鱼类”。与此同时，长江中的长江江豚、白鬃豚等淡水小型鲸豚类动物，因与人类活动接触密切，逐渐被中国古代先民记录下来，其形象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还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例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白秋练”的原型就是白鬃豚。鲸豚类动物在中国古代先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意象、信仰符号及政治隐喻中，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一重要物种在长期人海互动中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

中国先民对鲸豚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从先秦汉魏的初步认知，到唐宋时期的深化，再到明清阶段的趋于成熟，直至晚清近代实现转型。这一认知演变，是古人海洋实践、文化观念、政治需要与所处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从某种角度展现出中国先民的环境认知与价值取向。探究中国先民对鲸豚类动物的认知演变与文化内涵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一、先秦至汉魏时期的神话与想象

先秦至汉魏时期，是中国古代鲸认知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古人对海洋巨型生物的认知从无专门称谓的神话概念，逐步发展为有明确“鲸”字的命名，延伸至对动物形态的初步观察。

（一）先秦时无“鲸名”的巨鱼想象

目前先秦遗址出土的鲸豚类实物，以安阳殷墟发现的鲸骨较为闻名，但殷墟甲骨文中并未出现与“鲸”相关的记载。[3]先秦时期尚无“鲸”这一专用名称来界定鲸豚类动物，古人多以鯨、巨鱼、长鲸等称呼指代海中巨型类鱼生物。先民对这类巨兽的认识多来自传闻与神话，缺乏实际观察依据，未能形成对鲸豚类生物明确的认知，整体呈现出模糊化、神话化的特点。

《庄子》中记载“北冥有鱼，其名为鯨。鯨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4]。鯨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鲸，而是一种被神话化的巨型类鱼生物，但是对于鯨的想象却是古人对海洋巨型生物认识的开端。《山海经广注》中载有“长鲸”[5]。《楚辞·天问》亦有“鳌戴山抃，何以安之”的记录。[6]古人将这类未知的海洋巨兽归为海怪体系，赋

予其神秘莫测、巨大无穷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鲸的政治象征意义已初步萌芽。《左传》中“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7]，以鲸鲵喻指不义之人，雄者称鲸，雌者称鲵，后逐渐引申为凶暴之人。这一表述赋予了鲸政治象征意义，使鲸形象与礼法秩序相关联，成为其形象演变为政治符号的开端。

（二）汉代以来“鲸”字诞生与命名

汉代，“鲸”字正式出现，且被纳入文字学中的鱼部，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鯨，海大鱼也。从鱼，𩺰声。《春秋传》曰：‘取其鯨鲵。’鲸，鯨或从京”[8]，这一界定标志着鲸不再是单纯的神话创造物，而是作为一个物种正式进入官方博物分类体系，古人对这类海洋巨兽的认知开始从神话想象向纪实转变。班固《汉书·扬雄传》、张衡《西京赋》等文献中，关于鲸豚类动物的描绘逐渐成为常见文学意象。张衡《西京赋》中“海若游於玄渚，鲸鱼失流而蹉跎”[9]。鲸形象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神话叙事，开始融入现实语境，成为文人抒情、状物的载体。

《汉书》记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10]，如此巨大的类鱼生物搁浅死亡，极易指向鲸类集体搁浅的现象。受汉代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将此类现象视为“灾异”，鲸这种生物再次与政治意涵、讖纬暗示相结合。此外，崔豹《古今注》中“鲸，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鼓浪成雷，喷沫成雨”[11]的描述，是古人首次较为具体地记录鲸类生物换气喷水的生物活动。这一时段先民对于鲸豚类生物的认识突破了此前单纯的神话化想象，逐渐对鲸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描述。

汉魏时期古人对鲸的认识相比前代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古人赋予鲸巨大、神秘、可畏等特性，时人常把鲸记述为身长千里、喷浪如山、鼓浪成雷的“海鱼之王”，此种夸张之辞既是对鲸巨物本身的敬畏，也流露出当时观察条件的种种限制。鲸的政治象征内涵在汉魏时期得到充分、妥帖的发展，“斩鲸”[12]已然成为彰显平乱武功的绝好隐喻，继承并升华了先秦时期鲸的政治象征传统。

若细究汉魏人的思维逻辑，海洋本身即被当作不可控的自然力量的象征，而鲸作为海洋最庞

大、最惊人的生物，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海洋神秘性最生动、最有力的具象化身。曹植《洛神赋》中“鲸鲵踊而夹毂”[13]一句便极生动地将鲸与其他海洋巨兽并列，既突出其神秘威严之状，亦体现古人对未知海洋世界的深切敬畏，同时坦然承认彼时内陆文明对海洋认知的种种局限。

二、两晋至唐宋时期的博物认知

晋唐时期，海上交通与贸易逐步发展，古人与海洋接触日益密切，在航海中鲸这种生物被进一步详细地观测。这一时期对鲸的认知由传闻转向亲历，博物学发展使其分类更趋系统，象征内涵不断丰富。

（一）地理拓展与鲸的出现

从目前所见的正史及方志中可以看到当时大量有关鲸类活动及搁浅的细致记载，《南齐书》载“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鱼十二头入会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余丈，小者十余丈，一入山阴称浦，一入永兴江，皆喝岸侧，百姓取食之”[14]，对鲸闯入内河搁浅、民众分食的情形有极清楚、极生动的描述。与此形成补充的是《新唐书》中所载“开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鱼长六丈，自海入淮，至濠州，招义民杀之”[15]，也如实记载了鲸搁浅之后沿海民众对其的具体处置方式。

唐代各类航海笔记中，文人、海商、官员等群体留下了大量海上目击鲸的记录。《岭表录异》称“海鲎”为“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在记录鲸类换气时称“鲎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16]。这些来自于目击的记载，逐渐将鲸细致切实地记录描绘。

（二）博物学框架下的鲸归类

晋唐时期，各类博物著作、方志文献关于鲸的记录日益增加，对鲸的形态、习性、实用价值记载更为详细。《魏武四时食制》中记载“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丈，谓之鲸鲵……时死岸上，膏流九顷。”[17]，该记载记录了鲸搁浅后的状态，以及鲸油脂的实用价值。鲸类的利用价值逐步体现。《集韵》中记载鲸“五月生子于岸，八月导而还海，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畏之”[18]，这段描述细化了人们对鲸习性的认知，甚至观测到鲸会在春夏季节前往沿海繁殖，秋冬季节返回大洋。随着认知的深入，鲸逐渐成为博物学中明确的物种，原本带有神话色彩的巨型生物，在晋唐时期博物学发展的推动下，其形象变得愈发清

晰具体。

（三）鲸与政治、祥瑞、武功

唐代，社会繁荣稳定，国家实力强盛，鲸的政治象征意义达到顶峰，其内涵逐渐丰富，涵盖政治、祥瑞、武功等多方面。“鲸鲵”逐渐成为叛臣的代名词，“斩鲸”则成为平定叛乱、彰显皇权的象征，延续并强化了先秦以来的政治象征传统。李白《司马将军歌》中“直斩长鲸海水开”[19]，便将“斩长鲸”隐喻平定叛乱、建功立业，既体现了唐代的时代气象，也丰富了鲸的政治象征内涵。与此同时，鲸的出现被古人解读为政治兴衰的征兆，纳入五行灾异体系，成为天人感应观念的重要载体。如《新唐书》中对鲸搁浅的记载，便被视为“鱼孽”，与王朝兴衰、民生祸福关联起来，这与《盐铁论注》中“鲸鱼死而彗星出”[20]的记载所体现的灾异观念一致。

除了武功灾异的种种说法外，鲸在文学中被塑造为豪放壮阔的美学符号，既是力量雄浑的象征，也宜于表现文人的壮志豪情，辛弃疾《和马叔度游月波楼》词中“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21]一联堪称绝妙，将鲸与“鲸饮”“剑气”联结，呈现了壮阔豪迈之质，遂使鲸成为文人抒写壮志、宣泄豪情时极其有力、极有风神的意象，形成了鲸的美学意象。

两晋至唐宋时期，古人对海洋的探索不断加深，人与鲸接触更频繁，从想象转向实证。当时海洋开发、航运贸易、海防建设等活动兴盛，海上活动频繁，古人与鲸相遇的机会大大增加，所见场景也更为丰富，打破了此前以传闻、想象为根基的认知模式。《岭表录异》中所载鲸类之物，实为当时海民及官员直接观察所得，描写根植于真实经验，与先秦神话想象形成鲜明对比。航海笔记中对鲸的记录亦见古人的细致观察。航海活动既开阔了古人的海洋视野，也积累了大量实地经验，此时的鲸认知已趋于具象化、系统化，也恰是当时内陆与海洋文明交融的极佳体现。

三、宋元时近海社会与民间信仰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繁荣，近海开发加速，海洋社会兴起，渔民、海商与鲸接触日趋频繁。人们对鲸的认知从文人记述走向民间生活，实用利用与民间信仰并存，鲸逐渐褪去神话巨兽色彩，融入沿海居民的日常生活。

（一）宋元海洋社会发展

宋元时期的文人笔记与方志中，留下了大量鲸搁浅及民间利用的详细记载，展现了当时沿海民众与鲸的互动场景。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航海途中所见的“巨鱣”即为鲸，鲸随船而行，后游入深海[22]。宁波、温州、泉州等沿海地区的地方志中，也有关于鲸类搁浅的记载，如《咸淳临安志》载“永明九年，盐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水退不得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未死，有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取其肉食之”[23]，这一鲸类搁浅事件在《天中记》《格致镜原》等书中亦有收录，均反映了当地民众分食鲸肉、提炼鲸脂、利用鲸骨的习惯。

（二）从博物到实用

宋元时期，有关鲸的知识不再限于文人博物记载，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对这一海洋生物的认识趋向实用化。在医药领域，鲸被纳入药用体系，其药用价值得到系统记载。南宋洪遵《洪氏集验方》中记载“大鰓胶一味，碎锉，用无灰酒煮烂……治疝气偏坠。”其中大鰓胶为鲸脂熬制而成。宋代人们已认识到鲸的药用价值，文献明确记载鲸脂、鲸骨可入药治疗疝气等病症，丰富了传统医药内容。不仅是药用价值，鲸在农业中的实用价值凸显，鲸脂用作肥料、照明燃料，鲸骨制成农具与建材，成为沿海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在海防与航海方面，人们通过观察鲸的活动规律进行导航与气象判断，为海上航行提供了便利。

（三）鲸作为海神与灵物

宋元时期民间对鲸的敬畏发展为具体的信仰及禁忌，形成了完整、成熟的民间信仰体系，既源于对鲸庞大体型的敬畏，也契合沿海民众的海洋生存需求，成为民间海洋文化中重要的内容。在海神崇拜中鲸被视为龙王化身、海神使者，搁浅之鲸即称“龙搁浅”，民众不敢随意捕杀，必举行祭祀以求海上平安。这是对鲸最切实、最郑重的敬畏，也体现了当时民间将鲸与海神信仰自觉、巧妙地结合的认知特点，鲸被纳入民间海神崇拜体系，成为沿海民众精神寄托的具体载体。

民间形成了“不杀搁浅鲸”“不食鲸眼”的禁忌，其根本原因乃是对鲸的敬畏，又必然包含朴素而可贵的生态智慧。《述异记》中载有“南海有明珠，即鲸鱼目瞳”[24]，古人因而将鲸眼视为“明月珠”，捕杀鲸、食用鲸眼都会招致海难，该禁忌客观上起到了约束人类对鲸过度利用的作用，也表达了民间对鲸的敬畏。民间尚有鲸搁浅

系因“触犯神明”遭贬谪的说法，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天人感应的传统观念，把鲸的异常现象与神灵意志、人间祸福联结起来，强化对鲸的敬畏，也使民间鲸信仰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宋元时期近海开发加速，人鲸互动大大增加，鲸从远方巨兽变为近海邻居，当时人们对鲸的认识从单纯的敬畏自然转向实用与敬畏并重，也形成了仅利用搁浅个体、不主动捕猎的节制格局。其节制利用的生态智慧实为敬畏自然、满足实用两者平衡的体现，也是传统环境观念中颇有意义的一部分。

四、明清时对鲸类认知的固化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时代对鲸类生物认知的成熟定型阶段。各类类书、博物志与本草著作对鲸类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与传播，形成完备体系。官方与民间认知并行发展，文学意象趋于定型，传统认知达到顶峰并就此定型。

（一）明清类书与博物著作

明清时期，文化繁荣，类书、博物志、本草著作大量编纂，学者们对前代对鲸的知识进行系统整理、补充，结合当时的观察经验，使关于鲸的认知逐渐定型。

李时珍《本草纲目》将鲸纳入“鳞部”[25]。该书不仅梳理了前代关于鲸的记载，还结合当时的观察经验，明确区分了“鲸”与“人鱼”，纠正了此前部分文献中的认知偏差，使鲸的物种辨识度逐渐提升。明万历年间王圻、王思义采用“图绘以勒之于先，论说以缀之于后”的体例著成《三才图会》，其中载“鲸，海中大鱼也”[26]，王圻绘录的鲸的图像，在图画中鲸化身为一条巨型鱼类，张口吞噬小舟，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其时的鲸形认知更为具象。尽管明代学界仍将鲸视为巨型鱼类，但在长期的文化演绎中，其形象被广泛复制、传播并逐渐定型。《三才图会》刻本现存于世，作为考察明代人对鲸类生物认知的重要实物，它不仅推动了相关知识的流布，也加速了这一传统认知的定型。《广东新语》等沿海方志中，不乏有关鲸的种类、分布区域、搁浅规律等内容，如将“蜃家贼”比作鲸鲵“蜃家本鲸鲵之族，其性嗜杀”会伤害劫掠民船，干扰沿海居民，而其中鲸的形象也逐渐定格为凶狠的破坏者。有明一代的记载均基于沿海民众的实际经验，对于鲸的认知更加细致、贴近现实，也体现了明清时期对鲸的认知的地方性与实用性特征。清代博物

学家聂璜在其海洋生物志《海错图》中，将鲸类称为“井鱼”，并以图像形式将其描绘为头部可喷射水柱的大型水生鱼类。这一记述与图像呈现，反映了清代中期士人对鲸豚类动物的经验性认知与博物学记录范式，也为考察中国古代海洋生物认知体系提供了典型例证[27]。

（二）官方与民间双重认知并存

明清时期对鲸的认识略有不同。官方继承前代的政治化认知，把鲸纳入异物体系以服务于政治叙事，而民间从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形成真实具体的地方性知识，二者互为补充、相对独立，共同构成当时鲸认知的双重体系。

对于鲸的官方记载延续了前代“祥瑞灾异”的概念，将鲸纳入异物体系，鲸的出现、搁浅等现象被用于政治叙事，如《海盐县图经》中记载“三十七年十月，有大鱼至，搁于东门海滩，其长十丈余”[28]，这类关于鲸类搁浅的记载与灾异紧密联系，与汉魏以来的天人感应观念一脉相承，将鲸与天命祸福紧密结合，成为官方政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海民众从事航海、捕鱼诸多活动，故对鲸类活动有长期、系统的观察积累，尤其清楚地掌握鲸洄游、繁殖规律，其知识偏向实用，直接服务于航海、捕捞，与官方政治化认知形成对照。文人书本知识与海民实践知识并存，前者承载文化内涵、政治象征，维系鲸文化的延续，后者指导具体利用，二者独立而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完善并定型对鲸的认知。

（三）鲸意象的文学定型

明清时期文学中所用的鲸意象已经成熟、丰富，文人继承唐代以来的美学传统，把鲸视为壮阔、有力等品质的象征，“长鲸”“鲸吞”“鲸波”等表述常被用来抒写壮志豪情，尤见于豪放派诗词，其中“鲸波”一词使用极频，既可实指浩瀚海浪，又用作武功抱负的隐喻，气势恢宏，雄浑奔放。此种意象既固化了鲸的文学形象，又充分地将其与自然景观结合，鲸的美学内涵得到极大拓展，也成为中国文人海洋美学最鲜明、最有力的符号，承载着文人对远方、自然等永恒主题的思考，既表现海洋的壮阔、鲸的磅礴，又流露文人对自然之美真挚热烈的欣赏。若再细加考察，可知诸多文学意象实为古人文化心理及自然观的精妙映照，对海洋有敬畏，对力量有崇拜，对自由有追求，三者联结，互为补充，中国古代

文学的精神内核更饱满、更丰盈，而鲸的美学意象也根植于古典文学土壤之中，成为真正经得起反复品玩、层层挖掘的经典符号。

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有关鲸类认知基本定型而尚未形成现代生物意义上的充分理解的时期，明清古人没有现代生物学及生态学的观念，对鲸的认识始终以敬畏、实用、禁忌、信仰等因素为基础，并让其共生调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鲸作了细致的形态描述及药用记述，但是仍将其归入“鳞部”，并未突破传统博物学分类框架。与此形成呼应的是，民间对鲸的信仰及禁忌亦源于神灵崇拜，绝非科学观察的结果。直到西方生物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后，古人对鲸的关注才逐步从政治象征、信仰意义、实用价值转向其生物属性及生态意义，传统认知模式也被现代科学认知所取代。

五、古人如何建构“鲸”？

梳理中国古代鲸认知的演变，实质上就是在考察古人关于鲸的认知路径、象征体系、环境观念等建构方式，鲸的认知史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深度关联，是古人文化建构与自然观察相融合的产物，也呈现出中国传统认知特有的逻辑脉络及文化品格。

（一）从神话巨物到具体生物

中国先民对鲸的认知变迁有迹可循，这一过程是从模糊到清楚、从想象到实证、从零散到系统，可一窥先民的海洋实践经验及当时的社会需要。

先秦时期，认知尚处在神话想象阶段，又无实地观察，古人对鲸的认识，以内陆文明对未知海洋的想象为起点，呈现为神话化的巨鱼形象，《庄子·逍遥游》中所载的“鲲”、《山海经》中所论的长鲸都属于此阶段的典型认知框架。汉魏时期，“鲸”字诞生，官方记录出现，认知从纯粹神话自然过渡到现实，但毋庸讳言当时仍以传闻为主，实地经验尚少，这一时期的重点是鲸的命名及初步分类，许慎《说文解字》对“鲸”的界定、班固《汉书》对鲸搁浅的记载都为此做了示范，并开启了鲸的政治象征传统。两晋到唐宋时期，海上交通、海洋活动空前繁荣，古人获得大量实地目击鲸的机会，认知从想象转向实证，海洋经验成为认知的基础，博物知识也逐渐系统化，鲸的生态特征及实用价值均得到充分挖掘。宋元时期，近海社会兴起，人与鲸的互动更加频

繁, 认知从文人书斋走向民间日常, 实用利用与民间信仰交织, 洪迈《夷坚志》中对鲸利用的详实记载、民间所承袭的鲸信仰禁忌, 共同构成了敬畏与实用并存调和的认知格局。明清时期, 类书与博物著作大量编纂, 对鲸的认知由此进入体系化、符号定型的新阶段, 李时珍《本草纲目》、王圻《三才图会》对鲸知识的系统整理堪称典范, 官方与民间双重认知体系都已成熟, 传统鲸认知达到顶峰并最终定型。

(二) 鲸的多重文化意义

中国古人对鲸的认识绝不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鲸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完整生动的象征体系, 且渗透于政治、信仰、美学、实用诸领域, “鲸”这种生物亦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符号。

鲸在政治符号层面与政治秩序有着明确的联系, 既是逆贼的隐喻, 《左传》中以“鲸鲵”喻不义之人, 又是平乱武功的象征, 李白诗中“直斩长鲸海水开”即为明例, 同时又被系统、妥帖地纳入祥瑞与灾异体系之中, 班固《汉书》、宋祁等《新唐书》都把鲸搁浅当作灾异来记载, 并以此解说天意、颂扬皇权, 融入帝国政治叙事。在信仰符号层面, 鲸被民间奉为海神、灵物、龙王化身, 洪迈《夷坚志》中所载鲸祭祀仪式即为印证, 相关祭祀仪式及禁忌规范既规范了人与鲸的关系, 也切实强化了古人对海洋的敬畏之感, 与此后的任昉《述异记》中“鲸的眼睛化为夜光珠”的传说形成绝妙呼应。在美学符号层面, 鲸是中国文人海洋美学最富魅力、最见风神的意象, 象征壮阔、力量、自由, 故辛弃疾、高启诸家诗中常见以鲸抒写对远方、自然、自由的追思, 使中国古代文学及美学都增彩生辉。最后, 在实用符号层面, 鲸的肉、脂、骨等部分都曾被直接用于饮食、医药、农业、建材诸领域, 唐慎微《证类本草》、王祯《农书》中均有详实可靠的记载, 可知鲸早已真正融入民间日常生活, 成为古人生产生活中实实在在、经得起反复利用的资源。

(三) 人与鲸的互动

古人对鲸的认识实际上是中国人传统环境观的体现, 古人对鲸这种生物的认知过程, 也体现了敬畏、实用、想象三者的平衡, 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脉相承。

古人对鲸始终怀有敬畏之心, 因认为鲸是海洋神秘性的化身, 故极少主动捕杀, 宋元时期对

搁浅鲸的祭祀仪式就是这种敬畏最典型、最诗意的表达, 即其根本出发点绝不是科学知识, 而是对未知自然力量的敬畏, 也由此引出传统环境观念中“敬畏自然”的基本精神。更可贵的是, 古人对鲸的利用一贯克制, 以搁浅个体为主, 不主动捕猎, 洪迈《夷坚志》、萧子显《南齐书》中所载案例皆以搁浅个体为对象, 故能将实用需求与自然保护两者调和, 堪称实用而非掠夺的示范。从认知逻辑上考察, 古人对鲸的认识以文化、信仰、经验为根本基础, 绝不是现代实证科学的框架, 将鲸列入“鳞部”, 将鲸搁浅视为灾异, 此种“想象而非科学”的认知模式实为一种别致而富洞见的“文化生态观”, 即人与自然当共生共存, 而非人类征服自然。

(四) 一种被文化重塑的生物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可以考察中国古人对鲸的认识, 古人对鲸的形象、意义及价值的理解都是对中国古人社会生活等各种因素加以回应的文化建构, 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特质及环境观。

鲸绝不是单纯的海洋生物, 更是政治、信仰、美学、实用等文化意义的载体, 对鲸的认知历程必然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环境变迁、海洋开发有直接、深刻的联结。古人对鲸的命名、分类、利用、信仰, 皆是以自身文化需求及生存经验为出发点, 对鲸进行种种有目的、有逻辑的文化赋予与建构: 给鲸命名为“鲸”, 即源于古人对其巨大体型最直观、最明确的认识, 把鲸纳入政治象征体系, 是为了满足古代帝国的政治需要, 而将鲸奉为海神, 则是沿海民众生存信仰的具体体现。这些文化建构相互呼应、彼此支撑, 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环境观念的特质, 人与自然共生, 文化与经验互为补充。对鲸的认知史, 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环境认知及文化观念生动的缩影。

结语: 以鲸为镜——传统环境认知的特质与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对鲸的认知实质上是古人与海洋、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 故其既是古人对自然的观察结果, 也含有古人独到的生态智慧, 总结这一认知史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对当代海洋生态保护也有直接启发。

中国古代对鲸的认知有逻辑严密的阶段演变, 可自然、妥帖地归纳为从想象到实证的递进过程, 先秦时期鲸以神话巨兽的形象出现, 当时的认知

以想象为主，汉魏时期“鲸”字产生，官方开始系统记录，此时的认知已向现实过渡并初现政治象征意义，晋唐时期实地目击记载大量增加，鲸的认知趋于实证化，其生态特征及实用价值都得到初步挖掘，宋元时期鲸与民间生活联系更直接，此时的认知已显示出世俗化，明清时期鲸认知达到体系化、符号化的高峰，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鲸的认知。

以中国古代鲸认知为研究对象，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以物象史视角将鲸纳入环境社会史框架，即可突破传统研究的种种局限，有效丰富环境史研究的维度，对同类自然物认知史研究具有示范意义。在新文化史的框架下，用深描、符号史等方法复原古人对鲸的感知世界，厘清其文化符号演变逻辑，也切实推进新文化史在自然物认知研究中的应用。在认知建构层面，系统考察鲸认知的演变过程，便能论证鲸认知是人与海洋互动的文化产物，并说明传统认知乃生存需求、文化传统、自然观察三者交互建构的结果。

中国古代鲸认知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具有现实意义，就海洋保护而言，古人“敬畏自然、节制利用”的理念，以及以搁浅鲸为主要利用对象、不主动捕猎的具体做法，都可直接成为当代鲸类保护、海洋生态修复的极佳参照，也在提醒人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积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环境观念建构而言，古人所推崇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认知模式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桎梏，对当代树立正确环境观、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乃至促使人类社会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共生”，都有极其重要的正面启发。

参考文献：

[1] 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 王丕烈著：《中国鲸类》，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年。

[3] 李志鹏著：《殷墟动物考古90年》，《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第90-100页；陈翔著：《动物与晚商王朝的权力秩序》，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第101页。

[4] 庄周著、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5] 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6] 洪兴祖著：《楚辞补注》，北京：中华

书局，1983年。

[7] 左丘明著、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8] 许慎著、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

[9] 严可均等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0]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1] 崔豹著、牟华林校笺：《古今注》校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12] 房玄龄著：《晋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13] 萧统编：《昭明文选》，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

[14] 萧子显著：《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5] 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6] 刘恂著：《岭表录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17] 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8] 丁度纂、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集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

[19]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20] 桓宽著、王利器注解：《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21]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2] 洪迈著：《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3]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24] 任昉著：《述异记》，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年。

[25] 李时珍著、刘山永编：《本草纲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26] 王圻、王思义著：《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7] 聂璜著、戴启飞等译注：《海错图》，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

[28] 胡震亨著：《海盐县图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